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意识 构建的历史进程及启示

——以 1972—2001 年《人民日报》为视角

凌承纬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1)

摘要:从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环境保护起步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政府重视、制度架构、社会动员等层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从认识到参与环境保护中介环节的生态文明意识,它的构建和培育既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表现,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证。通过对我国生态文明意识构建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和发展具有良好的趋势,同时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关键词: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意识;构建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5)07-0114-07

DOI:10.15993/j.cnki.cn35-1198/c.2015.07.020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也十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依靠新的治理措施以外,更为根本的是要实现公众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和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生态文明意识是人们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过程所形成的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与行为倾向。意识会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建立在生态文明意识基础上的环境保护认知,将促使个体产生有选择性的思想倾向以及有意向性的行为倾向。因而,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一、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

经过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面对逐渐严峻的环境形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污染给山河所带来的不能承受之重。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年飞速发展,增速始终接近或超过两位数,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作为迅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中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人们已经意识到,要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阶段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要增强生态文明观念的培育,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构建起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这就是生态文明意识。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之前出版的报刊书籍甚至是工具书中,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这类字眼。在人类中心主义占据主流的年代,人们在衡量自然的价值时运用的是功利的价值

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凌承纬,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社会经济史。

观,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概念完全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和科学所讨论的范畴之内。因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财富的许多进展皆发源于“人定胜天”的意识,所以自农耕时代起直至 20 世纪,没有人对此提出疑义。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的是被誉为现代环境运动之母的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她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中描绘了一个没有鸟鸣蝶飞的未来世界,论证了由滥用杀虫剂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尽管蕾切尔的观点与经济实用主义者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甚至由此引发了针对她的人身攻击,但正如她所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当社会发展日益暴露出原来隐藏较深的环境问题时,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承认自身对自然所应负的责任,不再漠视生态问题,逐渐愿意将自然视为人类的道德对象。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个体的价值体系塑造了个体自身一整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所以说,解决环境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培养公众个人的生态意识,只有当公众价值体系中包含有客观的、符合生态文明且超越个体有效性的价值判断时,才会在行为目的、方式和途径的选择中做出生态的考虑,更好地约束自身,做出更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行为。当人类文明发展到后工业文明阶段,在经济建设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能否预先考虑生态环境和正确对待生态问题是否具备生态文明意识最根本的标准。生态文明意识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不仅包括了生态思维、生态道德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包括了环境科学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只有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才是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和法规制度得以落实的保障。

二、《人民日报》中有关于生态文明报道的内容分析

生态文明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古已有之,但作为专业术语被赋予文化伦理形态的内涵却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中国的生态文明意识是以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意识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1、起步时期(1972 年-1978 年)

中国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源于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次被《纽约时报》誉为“思想革命”的会议为中国启动环境保护提供了契机。正是从这次会议开始,《人民日报》中首次出现了关于环境保护内容的报道^[1],中国从极左思潮宣扬的“社会主义没有污染”的误区中幡然醒悟,逐渐认识到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当时对环保的认识还停留在处理工业“三废”的层面,但是已经明确指出虽然技术经济条件有限,也应该“认真处理,防止危害。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使花费一定的代价,也是十分必要的”。^[2]经济发展应与环境保护并重的认识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会议制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保方针。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从原先不懂,环境保护的确切含义,迅速过渡到把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除了国家层面开始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部分群众也开始注意到了经济建设对环境的污染。《人民日报》在 1973 年 10 月 15 日刊登了一封湖北天门县李场中学的陶家庆、艾学用以《环境保护工作要抓紧》为题的群众来稿^[3],反映的就是“三废”对生活环境污染的问题,这说明环境保护的意识已经逐步在公众中得到启蒙。这一阶段关于环境保护的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宣传党的环境保护政策,普及环境保护的知识。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一件关系到广大人民健康的大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制定环境保护的法令和条例,保证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4]我国的环境保

护工作,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心。新华社记者就带着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访问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环境保护包括哪些内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怎样?对进一步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有什么要求和措施?为了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有哪些政策问题需要注意解决?要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当前从思想认识上还要解决些什么问题?”做了详细的访谈。^[9]刊发评论员文章,强调要“加强领导,确保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法令和条例的贯彻执行……加强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加速培养技术人才,大力宣传和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10]。第二,基层环境保护工作的优秀典型和先进经验。例如,在报道福州工业发展成就时,特别提到了曾经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介绍过的福州市赤卫区第一翻砂原料社的防尘经验^[11];北京石油化工总厂通过设置环境保护机构和监测系统,建立规章制度,认真落实“三废”治理工作^[12];受到严重污染的湖北省鄂城县鸭儿湖在省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经过综合治理环境得到改善^[13]。第三,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外事活动。1972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中国派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人民日报》在1972年6月的11、13、17、18日连续刊登了四则新闻,报道我国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及讨论《人类环境宣言》的情况。此后,我国还参加了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等国际环境会议,逐步了解世界环境保护的形势。同时,开始宣传介绍国外先进的环保经验^{[14][15]},邀请日本等发达国家来京举办环保领域产品和技术的展览会,并派环境保护考察团前往日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挪威等国实地考察。这一时期的中国,深陷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里,对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很深入,在普及环境保护的同时贯穿着“阶级斗争”的思想,《人民日报》上环境保护宣传的话语体系也主要是不容置辩的高调论述。

2、奠基时期(1979年-1992年)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主题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性转移,其中一点就是迫切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虽然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2],但显然这一条款并不完备。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13][14]},明确提出了要立法保护环境。1979年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的经济开始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也正是在这一年,《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制化的进程。据相关资料显示,日本于1967年制定了保护环境的相关法律,美国是1970年,英国是1974年,法国是1976年。虽然截至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仍然有待完善,但就时间而言,中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并没有落后很多。当时,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认识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保障。同时,各国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系统比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如何在符合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寻找一条良性、持续的发展道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首先,注重依靠法治来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结合经济调整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贯彻执行环保法,把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逐步控制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国策地位的确立,使得环境保护从经济发展建设的边缘地带转移到了中心位置。为了贯彻落实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1989年对《环境保护法》作了修订,还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

土保持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初步构建起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其次,向西方发达国家借鉴环境保护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一年间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这是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同世界展开了全面的交流,我们在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了解到了西方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相继刊登了《瑞典农业大学见闻》(1979年5月13日,第6版)、《西德的“自行车热”》(1979年5月20日,第6版)、《澳大利亚景观一瞥》(1979年7月3日,第6版)等文章,宣传介绍西方国家的环保理念,尤其是对于日本的环保介绍最为详尽^{[14][15][16][17]}。日本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片面追求工业发展,忽视环境保护,虽然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带来了全国性的严重污染。在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下定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1970年起,用5-7年时间,使公害问题基本得到治理和控制,环境状况有了显著改善。日本的基本国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近似,他们在环境立法、标准制定、机构设置、技术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最后,重视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提升和人才的培养。环境保护不仅是一项新的事业,更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科学领域。自我国引入环境保护的概念以来,环保的重要性日渐突显,环保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经济建设受“左”倾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仍然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难题,而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组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开展环境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把科研成果尽快转换为效果好、易推广的技术成果。同时,还强调要把培养具有环境保护专业知识的人才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不仅要在国民教育中普及环境科学知识,还要把环境保护教育作为培训干部的一项基本内容。要加强宣传环境保护法和环境科学知识,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18][25-29]}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也指出“保护生态环境要靠科学”。^{[18][39]}环境科学在1991年被国家教委定为与物理、化学等平级的国家一级学科。以往,环境科学只是作为一级学科的分支,设立在生物、化学、地理等一级学科内。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对环保要求的提高,环境科学也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研究系统。^[19]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环境保护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和管理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3、发展时期(1993年-2001年)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年。面对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国的环保历程也进入了污染加剧和规模治理时期。这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世界自然环境的状况也在不断恶化,如何减少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课题。1987年时任世界发展和环境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第一次系统论证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其理念正是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寂静的春天》。人类对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价值取向的反思,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正式诞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至此,人类的环境意识及其培育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实现了从单纯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意识培育向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培育的转变。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的各项工作,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接受了会议通过的文件,并签署了两项公约。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国际上承担了一定的义务和责任,也符合做好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推动经济加速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环发大会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批准了《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我国环境与发展领域应采取的十条对策和措施,分别是:(1)实行持续发展战略;(2)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3)深入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认真治理城市“四害”;(4)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结构;(5)推广生态农业,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6)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强环境科学研究,积极发展环保产业;(7)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8)加强环境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环境意识;(9)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10)参照环发大会精神,制定我国行动计划。“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特别是第8点强调“各级宣传部门和广播、电视、报刊等单位要把环境保护宣传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和经常性的任务,大张旗鼓地宣传环保方针、政策、法规和好坏典型”^[20]。开展主题环保宣传活动和绿色创建活动成为这个阶段环境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当属从1993年开始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是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牵头会同中宣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部等14个部门共同组织,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8家中央和行业新闻媒体共同参与,是一项以新闻媒介为主体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每年的主题都围绕着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与资源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而制定。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至2001年底,《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环保世纪行”的相关报道达129篇,充分调动了宣传舆论的力量来唤起全民族的环境危机意识。根据1998年我国首次大规模的公众环境意识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数公众认为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严重。其中,认为污染“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人数比例为56.7%,远高于认为“不太严重”和“没有问题”的22.8%。但同时,公众对于我国环境状况变化趋势的认识是趋于乐观的,对政府采取的环保措施也给予了肯定,认为环保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教育工作,有79%的被调查者主要是通过电视、广播以及政府部门的宣传工作和阅读报刊杂志来获取环保信息。^[21]主流媒体对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构建以及动员个体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进入21世纪以后,《人民日报》对于环境保护的宣传内容从单一的政策宣传逐渐转向更加贴近百姓生活:2000年12月16日,第7版刊登了一副名为《高原故城》的照片。伴随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风土民俗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富有现代意义和发展前景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有些传统的、具有浓厚人文内涵的东西,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失,用影像资料来记录充满运动的变化过程,更利于唤起社会的保护意识。除了内容的侧重有所改变之外,一种新的宣传形式也悄然兴起。2000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第8版刊登了一则题为《永远的罗布泊——环保与开发》的消息:罗布泊是传说中西王母的瑶池,曾经有方圆千里、烟波浩渺的湖泊,然而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成为环境恶劣、生态被破坏的惨痛例证。这是关于罗布泊的系列环保公益广告之一,拍摄这一系列环保公益广告的目的就在于提醒公众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务必要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一时期,随着大众媒体的迅速发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活动的展开,政府和公众环境保护的意识不断加强。

三、关于增强生态文明意识的思考

环境问题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源于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淡薄。公众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从而产生对资源的不合

理利用和破坏。然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2](P410)},自然的发展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克服对资源环境的“超支”,是目前我国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不得不面对的双重任务。为此,生态文明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3](P20)}。将生态良好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并明确了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和建设的推进奠定了理论的基础。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随后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指出“国家宣教和综合评估能力不足,部分领导干部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水平有待增强”,“要加大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环境法制的宣传力度,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温家宝在出席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在保护环境求发展”,这是对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价值观的反思;二是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是可以并行的,但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三是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绝大多数的环境保护运动是由政府发起、支持和赞助的,比如前文中提到的“中华环保世纪行”。这种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动员,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唤起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长环境保护知识,对于人口众多、时间紧迫、任务沉重的我国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有着一定的实用性。不过,对于参与其中的个体而言,当大规模的集体活动结束后,又有多少意识、内容亦或是行为规范能够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是值得反思的。生态文明建设固然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提升等等要素的保障,但在根本上必须付诸于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现在的状况是理念与行为的严重脱节,人们一方面呼吁要加大保护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力度,另一方面又在具体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某种冷淡和随意。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人们实际采取的日常生活环境保护行为主要以能降低生活支出或有益自身健康的行为为主,而对于可能增加支出及降低生活便利性的环境保护行为则相对较少采用。另外,公众的环境保护经历绝大多数仍旧停留在被动接受大众传媒的环保信息的阶段。在被调查的3034人中,主动参与环保宣传活动的仅占22.3%,加入民间环保组织和为解决日常污染问题进行投诉上访的分别仅占2.1%和1.6%,而没有任何环境保护行为经历的高达12.9%。^[24]如何有效增强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如何将公众对环境保护问题的认识从环境污染事件受影响者的客体角度转换成为主动置身于环境保护的执行者的主体角度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环境保护宣传以来,主要采取的是通过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对环境保护的认知从而促进其采取环保行为的宣教模式。通过1998年和2007年两次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的结果来看,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在不断提高,对于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也得到了强化,但是,这种宣教模式显然还存在着改进的空间。

首先,在这种宣教模式中,环境意识和环境认知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单一的无差别的宣教模式很难在广泛的群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水平的受众,在宣教的内容和形式上要有所差异。对于年长者、农村居民等可以侧重采取传统的电视、报

纸等平面媒体;对于年轻人则可以多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更好地提高宣教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其次,要使人们建立起环保有利于其自身的观念,就不能单纯以宏观的环保内容为宣教主题,而应该尽可能地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环保内容为题材。“宏大叙述”的环保宣传虽然容易营造全民环保的社会舆论氛围,但难以使人们建立起环保与自身生活的密切联系,容易使公众仅仅成为环境保护的监督者,而非实践者,甚至有时会产生推卸个人环保责任的倾向。以上这一点具体到实践就是要用主动参与式的活动取代被动式的接受,因为并非人人都会加入环保组织,而通过加大传媒渠道中参与式的环保宣教活动的比例,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参与性高的公众环保活动,将显著提高公民参与生态文明事业的热情。

参考文献:

- [1]我国代表团团长唐克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言阐述我国对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问题的主张[N].人民日报,1972-06-11(5).
- [2]方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N].人民日报,1973-06-16(2).
- [3]陶家庆.艾学用.环境保护工作要抓紧[N].人民日报,1973-10-15(3).
- [4]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1978-03-07(1).
- [5]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同环境污染作斗争——新华社记者访问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N].人民日报,1978-05-22(3).
- [6]环境保护要引起高度重视[N].人民日报,1978-07-11(2).
- [7]福州工业战线新事[N].人民日报,1974-05-29(4).
- [8]路线觉悟高,“三废变为宝”[N].人民日报,1975-02-28(3).
- [9]屠正峰.鸭儿湖恢复青春[N].人民日报,1978-07-11(2).
- [10]许庆美.伦敦的环境保护[N].人民日报,1978-10-07(5).
- [11]宜华.新加坡[N].人民日报,1978-11-14(5).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1978-03-08(1).
- [1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4]日本环境保护的成就时怎样取得的?[N].人民日报,1979-01-04(6).
- [15]象光.蓝海·绿地·阳光——访日散记[N].人民日报,1979-07-01(6).
- [16]柏生.访日印象(上)[N].人民日报,1979-07-24.
- [17]柏生.访日印象(下)[N].人民日报,1979-07-30(6).
- [18]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
- [19]环境科学定为国家一级学科[N].人民日报,1991-10-22(1).
- [20]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N].人民日报,1992-09-17(1).
- [2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教育部.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J].人民论坛,1999(7).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4]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J].世界环境,2008(2).

[责任编辑 陈晓宏]